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重要贡献

——“第八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
暨第九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综述

王丰 魏依庆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工程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部联合主办，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编辑部、《改革》杂志社和《西部论坛》杂志社等机构协办的“第八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暨第九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于 2019 年 9 月 27—29 日在西南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厦门大学、兰州大学等 100 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 180 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展开探讨。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白显良教授主持开幕式，西南大学副校长崔延强教授出席并致辞。崔延强高度肯定了此次论坛的意义，并希望各高校和研究院之间，尤其是全国各马克思主义学院和经济学院之间能够更紧密地交流、合作，携手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完善和创新。

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学部委员程恩富教授在主旨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具有十二大理论创新，包括社会主义三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利己利他双性经济人论、资源需要双约束论、公平效率互促同向变动论、公有制高绩效论、市场国家功能性双重调节论、大文化经济论、知识产权优势论、新帝国主义论、世界经济准中心论。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周文教授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思想包含七个方面内容，即本质特征、立场问题和发展目的、认识规律、体制机制、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战略和工作方法、工作策略。它从以下四个方面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实现了对现代经济学基本概念的重构：第一，强调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第二，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立场。第三，强调独立自主地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第四，将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上升到经济学理论。

复旦大学高帆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新命题，也是一个真命题，

其科学性在于其在特征事实、基本概念、理论命题和应用层面具有异质性和内洽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化仍处在破题和探索阶段，持续的建构需要回应实践问题，并重视理论的严谨性和创新性。

南开大学乔晓楠副教授认为，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商品的价值标准将发生两重偏离，即国别价值与国际价值的偏离、国际价值与国际生产价格的偏离。前者反映生产效率的差异，后者刻画国际价值的转移。统计、计算的相关数据发现：中国实现特定贸易逆差所消耗的国别劳动时间始终高于世界必要劳动时间，但差距在显著缩小，加之贸易结构的变化，中国逐渐从价值转出国转变为价值转入国。

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及其时代价值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和政治经济学者始终依据时代发展的新变化、新问题、新要求深刻阐释、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与时俱进地解决时代问题，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和时代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部主任余斌研究员指出，马克思的观点和斯拉法的观点是对立的，但是有人却窃用马克思的名义构建马克思-斯拉法模型，企图用斯拉法和他的继承者置盐信雄的错误观点来取代马克思的正确观点。这种所谓的马克思-斯拉法模型的准确说法应当是斯拉法-置盐模型，它的理论基础是投入产出量表。

中国人民大学李黎力副教授认为，现代货币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探究政府作用于经济的方式。但现代货币理论必须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更深入地研究政府赤字开支对宏观经济运行所产生的确切影响。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批判性借鉴和利用现代货币理论服务“大政府”建设方面，具有资本主义国家无可比拟的优势。

西南大学王丰副教授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刻而全面的调整，试图形成一种新的“四重三位一体”剩余价值积累新模式，即保障剩余价值榨取的国际—政治—霸权的第一重积累新模式、国家—社会—意识形态的第二重积累新模式、企业—经济—制度的第三重积累新模式、个人—文化—阶级的第四重积累新模式。

北京师范大学肖潇讲师认为，当代中国劳动关系转型是世界范围内资本修复和国家力量主导干预的共同结果。资本修复与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在特定时期的目标上存在交集，但长远看又存在根本分歧，这决定了中国劳动关系的调整必然出现由个别到集体的转型趋势。集体劳动关系的发展，是未来抑制资本通过创新修复方式对劳动进行控制和分化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3.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变迁与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政治经济学研究者正深入研究、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变迁和基本经验，为人类共同发展和繁荣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胡乐明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转型发展的成功，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转型方向明确稳定、转型方式积极渐进、转型路径双向互动。中国正处于转型发展进程中，必须加强社会建设并充分发挥社群治理的能动作用，必须发挥公平正义等社会价值的调节作用，必须进一步完善政党政治和政府治理，必须更好地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融合互动、共生共荣”。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蒋永穆教授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内涵的演

进依次经历了“技术为主阶段”“技术与制度并重阶段”“制度为主阶段1”“制度为主阶段2”四个阶段，并不断朝着科学、全面和系统的方向演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根源在于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积极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调整和完善农业生产关系，不断探索和开拓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路径。

辽宁大学张广辉副教授认为，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协同发展依次经历了小农户作为主要农业经营主体、合作和集体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协同发展四个阶段的变迁过程。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背景下推动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协同发展，需要规范不同主体行为、创新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强化农村人才支撑、发挥村委会的重要作用。

河北金融学院张扬副教授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壮大集体经济”不是指走传统的指令性集体经济，而是指新型集体经济道路，“新型集体经济”是在完善农村集体产权的基础上的一种新型的农村合作经济形式。走“新型集体经济”道路，实现“第二个飞跃”需要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提高机械化水平，二是提高管理水平，三是农村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四是集体经济收入比重提高。

4. 技术变革与未来社会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深刻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格局、推动了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日益成为政治经济学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领域。

武汉大学周绍东教授认为，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信息技术提高了人类收集、传递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扫清了制约人类掌握“总体知识”的障碍，为市场供求更好地对接和匹配奠定了基础，进而为实现中央计划和社会主义经济核算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行性，一种新型的“可调控经济”正在逐步成为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让政府取代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也不是要让企业行使政府的经济调控职能。

四川大学王彬彬教授认为，大数据、平台经济为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技术条件和制度组织条件。在信息时代构建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性方案，一是在体制架构方面，在数据流通、商品流通、货币流通等领域共同构建双边市场；二是在运行机制方面，对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采取民主计划，对规模化、同质化的消费需求采取集中计划；三是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应该是国有互联网平台企业。

西南财经大学吴垠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全面迎接高度个性化的自媒体“互联互通”时代，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传播矩阵，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移动新闻产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自媒体传播要重在传播“中国符号”，传播要具体化、对象化，传播要“以人民为中心”，传播要客观、全面、准确。

西南财经大学韩文龙副教授认为，在数字生产方式下，传统的劳动过程正在向数字劳动过程转变。数字劳动过程中仍然存在马克思所提到的异化和剥削问题。关注不同特征的数字劳动过程，对现实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首先，中国需要积极发展数字经济，关注数字劳动过程的新变化。其次，要引导和规范数字劳动过程中的雇佣关系和收入分配关系。最后，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探索建立工资保险机制。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系）

（编辑：黄华德）